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否定的逻辑

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赵旭东 / 著

民族出版社

赵旭东著

PDF

本书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系该中心课题成果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否定的逻辑

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赵旭东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赵旭东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0

(人文田野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635 - 0

I. 否… II. 赵… III. 人类学—文集 IV. Q9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7637 号

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著 者：赵旭东

策划编辑：倩 男

责任编辑：龚黔兰

责任印制：石小娟

封面设计：吾 要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8001 (传 真)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投稿邮箱：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民族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11.625

定 价：36.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635 - 0/Q·7 (汉 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自序

我想，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天然地是跟反思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那个时代，精神的追求与现实的物质生活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遥远了，现实逼迫着人们不能不去反思当下生活的意义以及改变的可能途径。因此，相比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6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更加知道什么是欲望以及当这种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的个体内在的精神张力。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60年代出生的人更加知道理想的说教与实际的生活之间的距离。我确实清楚地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因为被人揭发偷捡了一个从副食店柜台上滚落下来的茄子而受到了班里同学们的集体批判，随之便是开批斗会，大家齐声高喊“要斗私批修”，现在想来，这样的行为又是如何的幼稚！因为如果细细地去想一想，对于那时的极低收入的人而言，一个茄子就可能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家一天的菜肴，如果是这样，将落在地上的茄子捡起来带回家去又如何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呢？

也许是那个曾经有着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造就了我们出生在60年代人的反思精神，没有这些生活的刺激，反思的动力无论如何是不会涌现出来的。而与此同时，做学问的方式也会因为生活的境遇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家境富裕者很少肯于反思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差距，因为说白了，这样的差距根本就不存在，反思也就自然没有了可以反思的对象。这些人在学问的追求上也许是更加地乐于发展和承袭知识而不太肯于做些反思或者推翻既有的知识体系的工作。而另外的一些人，他们也许是由于家境贫寒，也许是由于生活坎坷，总之是现实离自己的想

象之间差距太大，那么反思的精神自然是会由于压力的缘故而喷薄升腾出来的。

我自己常常揣摩，自己的求学之路应该不属于前者而更贴近于后者，因此而造就的我的性格里从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耐心去建构一个什么看起来极为完美而又坚固的东西，甚至好像为一个建筑物增添上哪怕是一块砖的贡献都没有，大多数的时候却是更加愿意另起炉灶。凡是别人说过的，自己总是不大肯相信；凡是别人写下来的，总要觉得似是而非，一心想着有没有办法搞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后来读到哲学方法论之类的著作，才知道这也不是什么太坏的毛病，只是一种做学问和思考的方式而已。不过这样的做法要想坚持也是不大容易的，批评别人总也是中国人不大喜欢的，虽然有些人自我标榜喜欢接受批评，但是骨子里还是极为讨厌人家的批评的，越是权威的人物，这样的思想也就越是严重，心里也就越是害怕有人来批评。但是，我自己还是喜欢坚持这样的一种做学问的套路，从批评中寻求一点点做学问的快乐。

对于我是如何进入到中国乡村研究的方向上来，在本文集的第一篇文字中有了一些交代，这里也就不需要太多的笔墨去重复叙述了。但是，如何从反思的立场来看待中国乡村研究？除了我上述所谓的“时代精神”的缘故之外，实际更为重要的还要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学术氛围。这或许是今天的学术氛围中所不具备的一种知识的稀缺以及求知者对于知识的过度渴求。这一点因为过于琐碎而不大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学者所重视，但我个人认为，对我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

无论如何，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而中国社会真正的转型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如果说1992年以前的学术更多的是属于纯粹个人兴趣的、比较散漫的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到了1992年

以后，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以及多元的思想使得知识的场域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人们不再是或者说不再欣赏以一种随意漫谈的形式研究社会问题，而是更加乐于寻求知识的系统化以及规范化。在今天，文献的规范引用制度已经成为有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的普遍共识，但是在 90 年代之前，那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甚至最好是没有的状况。许多杂志刊登论文，其文献都是空白或者寥寥几个注释。大家更加习惯于就事论事，随意转述、摘引而不去罗列引注的来源以及思想来源者的出处。这种状况的转变应该说是在 1995 年之后，那个时候，一些很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杂志开始集中在“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上，其核心也是在强调如何借鉴西方的论文和著作写作中的引注制度。但总体而言，那个时代依旧是信息比较贫乏的时代，许多很有名声的教授学者据说就是因为去了一趟美国或者欧洲访学而带回来一本什么最新版的英文教科书，然后便以独占和介绍这本书的知识内容而成为某一个学科的领军人物，而今天这种状况再也不大可能发生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是有许多人在想尽办法寻找某一份资料去阅读，阅读不是问题，如何有渠道找到这份资料才是最关键的。而今天的状况却是有太多的资料等待人们的阅读，随着复印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获得一份文献资料已经不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问题，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网上下载你所需要的某一篇文献，这样的速度是十几年前所不可想象的。现在的问题倒是在于，如何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以及如何有很好的视角去思考了。要知道，复印机和互联网在中国都是 1995 年以后才得到大幅度发展的。我还清楚地记得 1995 年如果要复印一张 A4 纸大小的文献大约需要三毛钱，而今天在北京的高校附近价格便宜到了一张只要五分钱，最近有一份寄来的海报竟然说只要四分钱！

上述这样的粗略对比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就是，今天的工资收入大约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的五倍，而获得信息的费用不

仅没有增加反而是下降了差不多五倍。再看互联网，在1995年的时候，一个人要是想发一份电子邮件需要到专门的计算机中心去写和发送，那时为了节约写信的时间从而节约发信的成本，人们多是把信先写好，之后再快速地粘贴到电子邮件上去。而今天，互联网几乎已经是遍布整个城市，乡村的互联网也在快速发展，发邮件不仅快捷而且极度的便宜。而所有这些都似乎在潜在地造就时代的转变，或者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来说就是“转型”。

再回到我的主题中国乡村问题上来，毋庸置疑，中国乡村自然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社会转型的场所。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目光似乎都在瞬间投向了这个特别的场所，每一位研究者都希望能够从这种注视中找寻到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轨迹出来，以此来形成与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的比较。我所撰写的一些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文章差不多就是在这样的时间跨度里，也就是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的跨度里写成的。

这些文字描记了我自己有关中国乡村社会以及更为宏大的乡村文化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无力的，但绝不是苍白的那种无力，而是面对现实隐约具有的一种怀旧意识的无力，这种无力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无可奈何，因为面对正在逝去的乡村社会生活，我们真正能够做的又是什么呢？有些东西我们确实无法抗拒，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那种种的改变。尽管我们赞美过去乡村的朴素，但是当下的乡村正在变得异常浮华；尽管我们在大张旗鼓地建设新的乡村生活，但是与我们的理想相背扭的却是，许多传统的东西真的就在此建设过程中丢失掉了，留不下一点的痕迹。我自己并不是对这些消失有什么恐惧感，我觉得，古往今来，传统或者旧物的消失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显然，甲骨文已经不再是我们用来沟通的文字了，这是一种文字的消失；农民不再是肩拉人扛地去种庄稼，这也是一种

消失，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消失；人们不在天旱的时候祈雨，这同样是一种消失，是一种民俗的消失。凡此种种，都属于是由于有新的可以替代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发生的改变，这是一种新的乡村生活的发明。不过面对今天的快速变革，我最为恐惧的是，在乡村，人们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创造出新的、可替代的东西来顺利地取代正在消失的传统。

至少自 70 年代末中国乡村逐渐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乡村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高速度吸引了海内外许多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关注。在西方，人们更多的时候乐于用“后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种分析视角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速度已经使得许多既有的研究范式无法适应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现象，诸多学者避开“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分析模式，试图从费孝通早年的论著《乡土中国》中获得进一步思考新的中国问题的灵感，^① 并进一步试图抛弃西方既有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寻求由本土现象的描述而发展出一些可以适用于当下中国社会的理论。但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人生晚年的费孝通教授却另辟蹊径，不是从对社会现象的简单描记当中寻求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而是将中国当下的现实放在了更为宏大的文化比较当中来重新思考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未来，一系列的反思性的论文构成了费孝通晚年贡献给学界的又一个研究和思考的方向，那就是在文化自觉中寻求对于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判断。^②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晚年的反思已经超越了早年《乡土中国》从地方性中寻求文化的理解，而是重新将自己、自己的社会以及自己的文化放置在了多元比较以及多元欣赏的框架中来加以思考。费孝通最初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15 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②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一定不是寻求强化文化之间的隔绝意识，也不是文化相对论的，而是寻求在一种中国人久已深入到骨髓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中来达成一种对于文化隔离的超越和对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渴望。^①

对于这一点，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费孝通教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不是集中在他所提出的乡土中国的基本特质上，而是更加留意于我在论文中所一再提及的乡土社会其本身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在晚年坚信，这种变化是在发生，而且发生得很是迅猛，这种印象是建立在他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游历与观察基础之上而得出的判断。但是我当时只细致地研究过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的乡村，^②对于先生的提问，自己并不能够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即便是今天，我依旧不能够向费先生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实际却是一个极为难于回答的问题。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转变，甚至用更加凝固化的语言说是一种社会转型呢？如果仅仅凭借看到一些表面的改变就误以为是整个社会乃至其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改变，那肯定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武断，因为如果是那样，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在西方强大的物质文化的冲击之下不会发生得那样缓慢，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许多的行业还要说与国际或者强调与西方接轨，也就是说这种转型仍旧没有完成，甚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自信心的高度膨胀，使得人们开始猜测中国是否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社会的发展可能不过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而非什

① 赵旭东：《在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载《探索与争鸣》，2007（3），16~19页。

② 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么转型，或者也可以说，那种建立在向西方看齐的现代性的转型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在中国发生过。

我也同所有伴随着改革的年代而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一样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改变，并且有意识地走进乡村，试图与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由此去切身体会他们所经历的改变以及他们对于这些改变的认识。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改变终究是一种变化而非转型，也就是不是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断裂。无可否认，变化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在这一点上，社会中也并没有哪一种东西会停留在单一一个状态上保持稳定不变。那些转变可小可大，小者无声无息，如涓涓细流，大者如疾风暴雨，倾盆而下。但是，这些都只是属于变化状态中的某一种状态而非最终的结果。我通过自己的观察描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旅游村落开始收取门票，又比如彩票进入到乡村，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逼迫我得出结论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型。因为这些都只是一系列的转变，是一个转变跟着一个转变的社会演进，这种演进自打有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来就一直并没有真正地停止过，而且未来还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面对这样一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我无法再认同于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单向度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肯定不能把眼光凝固在《乡土中国》所提出来的“差序格局”的结构性分析那里，我们还要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究竟是哪些要素已经无法支撑既有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的运行。在我看来，这里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作为行动者的个体本身，在这一点上，社会心理学家做了许许多多开创性的研究，但是由于结构分析范式的强大影响力，我们无法轻易地把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身上。不过，这样的状况确实已经发生了转变，特别是认知心理学逐渐被人类学所接受之后，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分析的视角落在了个人的认知上，在这些学者看来，根本是能够把外在世界与个人

头脑的思维联系在一起，认知活动在影响着外部世界转变的方式。同样是乡村旅游，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里的村民而言，那是被认知成为能够生财致富的一条途径；而对于那些外来的旅游者而言，那里却是一个能够获得出人意料的奇特感受的地方，这中间的差异是依靠不同的人们在认知上的不同而相互勾连在一起的。这更加说明了变化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但这些变化却是居无定所，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一个变化紧跟着另外一个变化，而人的认知活动恰恰是能够使这些变化发生的根源。

这样的认识使我们摆脱了那种对于乡村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忧郁症”，我们无法通过人为的安排来希望社会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而发生改变，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人们如何对外部表征的认知加工，我们所能够做的仅仅是提供各种的表征供人们自己去加工。^①那是一种人自身依照自身特点的认知加工，这种加工体现了社会与人的发展背后的自然逻辑，这个逻辑在我看来是跟某种哲学意义上的“否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可谓之作为一种“否定的逻辑”。这种否定的逻辑体现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否定的认知使得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了一种创造力，借助这种创造力，我们不会使变化变成一种固化，而是依随于那些自然的变化本身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显然也是到了开始反省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有过多的研究都试图将乡村社会本来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化的状态加以凝固，使其不再可能发生源自自身动力的任何改变。今天我们确实比以往用更多的标签来标定这个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的社会，但是人们会发现，这些凝固化的标签很快就会像一页纸一样地发黄，失

^① 赵旭东：《表征与文化解释的观念》，载《社会理论学报》，第八卷，2005（2），229～276页。

去光泽，因为确实无法给出一种确切的定义来称谓本来是在不断在改变着形式的社会现实。在这里，有两种研究范式是异常突出的，第一种是通过非民族志学者的民族志式的描述来试图告诉旁观者所发生变化，并通过社会学的修辞来强化他的描述的客观性和固定性。而另外一种则是激进地推进本来可能是缓慢的乡村社会的变革，他们借助把乡村界定成为需要社会医生去加以治疗的病人而对其施加一种改变的暴力，强行其改变，并劝慰这些病人说，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有益于他们的生活的行动。

上述这样的两种做法在我看来显然都是为了赢得观众喝彩的作秀，现实的社会的变化既没有前一种范式所描述的那样僵化，当然也没有后一种范式对于社会本身的变化所要求得那样的迅速。当晏阳初博士把中国农民诊断成为“愚穷弱私”四大病症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看到根本没有这些疾病的、大量的健康农民的存在。就像今天我们还是有刘震云笔下的“刘跃进”这位聪明到近乎有些狡猾的农民存在，当然也有《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那样的几乎是刻板化了的对于农民智力的扭曲。^① 在这里，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无法用类别的概念来代表作为一个一个的独立个体并有着个体认知能力存在的每一个的农民。

所以，社会的状况既没有第一种范式所构想的那样静止到可

① 刘跃进是作家兼编剧的刘震云最新创作的小说《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的主人公，这一号称是讲了一个“羊吃狼的故事”的小说同时也有由马俪文担当导演的同名电影发行，并号称票房价值不菲。刘跃进无疑是一个农民的代表，但是又不能够完全涵盖全部。而由兰晓龙编剧、康洪雷导演的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则是塑造了一个看起来有些木讷的农民士兵许三多的形象，他又再一次被描述成了一只羊，再一次叙述了一只羊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赢得群狼的同情的故事，但这依旧不能够代表全部的农民。两者都是对于农民性格的描述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歪曲，只是描述和歪曲的方向和着力点有所不同罢了。也许把刘跃进与许三多的制作过程进行一下文化社会学的回顾，那么对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根本也许可以找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解答。

以完全得到描记，当然也没有第二种范式所期待得那样随波逐流，从而轻易地改变着自身的形态。社会自身的逻辑是通过人的认知能力而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前者而又不同于前者的新的表征来保持社会的连续性以及变动性。我乐于称这样的过程为一种“否定”，也就是这个社会是以一种否定的逻辑为基础的，这在我所分析的华北庙会上有过详细的展开。但这也是一种可以复制到社会其他场景中的分析概念，否则我们无法对于同一个事物的前后改变有一个真正的理解。因此，变化就是人们认知表征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与人相互勾连在一起却又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目录

自序 /1

一、农民的理性

乡土中国与“学习”概念 /3

农民的理性 /19

历史、回应与反思 /38

二、村落门票

村落门票 /65

乡村生活的“损蚀” /86

移民与生路 /106

三、结构容纳权力

习惯的约束力 /125

作为家园的土地 /153

结构容纳权力 /174

四、否定的逻辑

中心的消解 /195

否定的逻辑 /219

民俗的易感染性 /244

五、文化认同的危机

帝国的隐喻 /275

文化认同的危机 /314

镜中的他者 /334

后记 /357



—

农民的理性

